

清谈活动下六朝骈文的生成

金沛晨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自东汉后期至南朝,清谈谈辞与骈文文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两者都有一个由粗糙到精致的演变,而且演变内容出奇一致:谈辞从朴素的品评变成讲究文采、音韵,用典的骈句,骈化散文也从初期不严谨的意对,单调的文法以及自然声韵变为对仗工整、文辞华美、用典密集和讲求平仄的骈文。鉴于清谈活动有着鲜明的政治背景,又是时代大风气,所以骈文文体生成一大重要原因因为清谈谈辞的发展影响到文章领域,使得文体骈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关键词: 清谈; 骈文; 谈辞;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68(2018)02-0043-06

DOI:10.14151/j.cnki.jcxk.2018.02.007

清谈活动对文学产生影响,前人已有论之。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惜其论述不详。此外研究大体着眼于清谈与某一文类的关系,如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何诗海《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学》^[3]等。殊不知,这些文类在当时都有骈俪化背景。探讨清谈对六朝文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研究清谈与骈文的关系。六朝骈文的成熟与兴盛,既受文体内在的发展驱动,也有外在因素的影响。先唐大部分骈体文作家都有名士身份或清谈背景,文士往往是谈士。谈辞在对仗、用典、藻饰、声律四方面的发展亦使文体朝着这四个方向逐渐演变,并最终形成了骈文。所以,骈文的最终确立是清谈之风笼罩下文体产生的变异。本文所引“清谈”相关概念,与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4]所提“谈论”意义接近,概念范围较广,并不局限于谈玄。

一、东汉末清议与骈文草创

清谈活动在东汉末具体表现为党人的清议活动,这时清谈还仅限于知识分子们对朝政以及对当世之人品、外貌、才能等评议,也可以略微把范围延伸到文人在清议活动中为获取高评价而产生相对应的论辩行为。但清议并不具备审美趣味,而是政治工具。在儒学衰微,士大夫参政无望的情形

下,西汉以来各种歌功颂德之文体已不足以适应社会当前局势。故东汉后期大赋数量骤减,而质量较高的文人五言诗与抒情小赋则大量涌现,这与人们必须以出众言谈来获取政治评价有关。

首先,士人们若能被党人领袖给予较高评价,便会为世所重,博得名声,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后汉书·党锢传》:“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5]¹⁷⁵⁷“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隳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5]¹⁷⁶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若想博得党人领袖的高评价,便只有通过“清议”来实现。

但在清议中博得高评并不容易,而要通过言辞使对方注意自己。《后汉书》中记载了东汉后期许多有关“捷对”的事例,绝不偶然。如“边让字文礼,除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5]²¹²²又蔡邕评价其“心通性达,口辨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捡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5]²¹²⁶这是文辞、谈辞俱优的典型例子。又《后汉书·郭符许传》:“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这里的“谈辞如云”,可从注引《谢承书》窥见:“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介绍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

收稿日期:2018-03-05

作者简介:金沛晨(1995-),男,广东中山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唐文学。

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5]1791} 这何尝不是辞赋的口语化呢?连清议领袖郭泰自己也“善谈论,美音制。”^{[5]1785}《郭符许列传》中不少品评为骈对,如“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狙,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5]1787} 以上例子说明在当时清议过程中,存在着以对句达成捷对、妙对的现象。

蔡邕上封事第五曾说“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5]1600} 虽指出清议活动消极影响,但同时反映出这种论辩活动存在“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骈化现象。以上所列例子均可说明东汉后期普遍存在着由清议导致的论辩风气,且论辩谈辞是带有文辞修饰性质的“妙对、捷对”。

士人们颇能通过这种捷对、妙对在清谈活动中受益,如赵壹,据《后汉书·文苑传》:“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羊陟)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5]2115-2116} 据《先唐文苑传笺证》考证,“袁逢”当为“袁滂”,而羊陟已在光和元年被免官禁锢,不再是河南尹^{[6]80-82}。但不管怎样,这段材料反映出的讯息为赵壹希望通过清议活动来获得品评,这点可由袁、羊身份推知。且赵壹之所以受到袁、羊二人的引荐,也是凭借在清议中的出众表现。这足以证明清谈大风气影响下士人获取名士高评的有效手段为出众的言辞。

当清议这种带有口头文学色彩的活动蔚然成风时,势必会影响到书面文学。东汉末作品骈俪化程度较高的文人,如边让,其《章华赋》:“旦垂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5]2123} 赵壹,其《刺世疾邪赋》:“德政不能救世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5]2113} 以及写《鸚鵡赋》的祢衡和《荐祢衡表》的孔融,他们要么是掌握着社会舆论力量的名士,要么曾经参与过清议活动。边、赵、孔不必多说,上述已说明这几位文人与清议有着紧密的联系。至于祢衡,《后汉书·文苑传》载“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5]2132} 祢衡擅长论辩,他具有名士背

景,与社会舆论力量紧密联系。同时,祢衡《鸚鵡赋》也是骈俪化程度相当高的赋作。东汉末作品骈俪化程度最高的文人是蔡邕,他的《郭有道碑》:“于时纓綉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7]1074} 对仗工整,且意对痕迹已基本消失,工整的对句占据全文极大部分,故不再全文列出。蔡邕本人是清议领袖,因此他为郭泰撰写碑文时,发自内心地认为“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5]1787} 综上所述,东汉末创作骈化程度较深的作家大多具有名士身份或清谈背景。具有名士身份的人背后有着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名士的每一句点评都能左右着一个士人的声望。士人为了仕进,只能通过参与清议活动并以“捷对”来获取高评。捷对往往是骈句,若表现在书面领域,就是书面作品的骈化程度加深。故清议在两汉文体演变过程中起到了促进文体抒情化与骈化的作用。

不过清议在东汉后期主要还是为政治服务,是以谈辞骈化现象还不算普遍,骈化程度亦不高。东汉时期的清议活动形式还不算多样,该时期的文章也只是骈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散文,而不是魏晋南北朝日趋繁缛的骈文。但谈辞的骈化现象对骈文文体的生成毕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魏晋清谈活动与骈文初生成

三国以来,清谈比起东汉时地位更高,影响更广。《魏志·王卫二刘传》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8]449} 曹植堪称曹魏最优秀文学家,他爱好清谈甚至达到了谈论前要整理仪容的程度,说明清谈是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当时上层统治者也具有谈士身份,既喜“俳优”,那么谈辞骈化程度理应较高。三国时谈士众多,连统治者大体也算半个谈士,刘季高对此已有所考证^{[4]107-1132}。此外,文士谈士二合一的现象依旧存在。除曹植外,王粲亦擅长清谈,《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云“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搁笔不能措手。”^{[8]446} 王弼《老子指略》,何晏《无名论》以及

嵇康、阮籍等人的文章大都骈俪化程度较深。这证明了从三国开始,谈论之风已完全渗透到社会主要阶级之中,发挥着比以往更强的影响。

该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为口头谈论与书面文学的关系日益紧密,二者时常捆绑出现。如《魏志·方技传》注引《轺别传》云“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状,英神以茂……’”^{[8]603}管辌的谈辞竟被认为堪比司马相如的赋作,这是谈辞被视作口头文学的明证。正因为二者性质相似,所以才存在着比较的可能。谈辞身为口头文学,一旦被人用笔记录下来,便和书面作品无异。更何况谈辞成篇现象实际存在,如《魏志·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云“中书令松进曰‘又发德音,赞明少康之美,使显于千载之上,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后。’”^{[8]102}又注引傅畅《晋诸公赞》:“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8]104}有了“成篇”的过程,口头文学得以直接通过纸张等媒介转化为书面作品,口头与书面的区分已不明显。魏晋以后的谈辞越来越骈俪化,一旦反映到书面之中,便是一篇优美的骈文。虽看似谈辞与文辞相互影响,但由于清谈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统治者的好尚,谈辞对文辞的影响势必大于文辞对谈辞的影响。因此说谈辞的发展促进了文辞的发展,更为准确。

魏晋清谈活动亦开始具有审美性质,这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虽玄风大涨,三玄是清谈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人们热爱谈玄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老庄思想影响下风姿绰约的谈士形象符合他们所认为的人物品评最高标准:名士。与《世说新语·任诞》所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9]1299}本质相同。

《后汉书》记载了许多相貌出众的人,但主要还不涉及审美。像郭泰“美音制”这种评论人声音的记载不算多。可到了魏晋,描述人声音好听的记载却突然多了起来。如《晋书·张光传》:“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声。”^{[10]1563}《晋书·忠义传·王育》:“身長八尺余,须长三尺,容貌绝异,音声动人。”^{[10]2309}审美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赏音,这标志着以政治为主要目的的清议开始逐渐过渡为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清谈。《世说新语·言语》记载“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

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警,林岫便已浩然。’冈白驹注“途中苦风霜,常人旅况,此固所不论,山川萧条,集其惨澹,在韵士尤甚。”^{[9]264-2265}细观道壹的谈辞,读来朗朗上口,十分具有音韵美,此固是一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好整饰音辞”的对象是道人,在魏晋时期,道人大多具有清谈背景。另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冷然若琴瑟。”^{[9]360}“冷然若琴瑟”是对音色性质的判定,可以看出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了声音在清谈场合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世说新语·品藻》:“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9]900}“韶音令辞,不如我。”证明在魏晋清谈活动中,音色美妙与否已然成为了评判的标准之一。是以出现了“支遁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9]394}这样沉醉于声音而忽视内容的情况。

赏音水平提高与魏晋以来人们注意到自然声韵有关,如曹魏李登就撰有《声类》一书。世间流行的清谈活动也同样注意赏音,是以作家在创作中留意作品的音乐美便显得理所当然。西晋骈文好手陆机在创作《文赋》时曾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7]312}其本人也被蔡谟称为“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忼慨。”^{[9]751}蔡之评语亦着重于陆机的声音,这或多或少能窥见骈文好手陆机在清谈场合的风采⁽¹⁾。曹魏以来自然音韵的注意到东晋则更进一步,作家们开始为自己作品中洋溢着音韵美而自豪,如集谈士文士身份于一的孙绰,曾得意地评论自作骈文《天台山赋》:“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10]1544}

在句式骈化与文采方面,魏晋是东汉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除去语音方面,不管是谈辞骈化或者谈辞藻饰,魏晋谈辞的华丽远远超过东汉的朴素。东汉清议虽有“捷对”、“妙对”的现象,但对仗还不算特别工整,“意对”⁽²⁾的色彩较浓,文字也相对朴素。魏晋时的骈化句式却往往与华丽的辞藻联系在一起,如《言语》:“人问之曰‘卿凭重恒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9]267-268}该例之背景虽不在清谈场合,却反而更能看出清谈风气在士人日常生活中的浸润。从以上所举例子看,谈辞不光句子对仗更为工整,而且讲究文采。还有几个例子能说明

谈辞讲究文采较为普遍,如《世说新语·文学》:“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9]386}支遁本人谈辞之华丽如盛开的繁花,连王羲之都沉醉其中,目眩神迷。又“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9]396}可以看出清谈活动中主客谈辞华美与否甚至带有竞赛性质,这势必会对书面文学的创作也产生影响。谈辞华美,重要表现之一在于骈句的使用。而东汉以来通过清议得到赏识以求仕进的传统,依旧被晋代清谈活动完整无缺地继承。《文学篇》:“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即用为太常博士。”^{[9]412}

《文学篇》里的记载大多为谈士精妙之谈辞,恰能反映出魏晋到南朝宋,谈辞在士人们心中的定位。《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11]2293-2294}又据《宋书·刘义庆传》可知,刘义庆在元嘉十六年成为江州刺史,此时身边聚集了袁淑、鲍照等文人^{[11]1477}。那么编纂《世说新语》大致也在这段时期,基本与四学馆建立同时或稍后。文学馆和玄学馆的设立证明时人对文学与玄学的差异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而《文学》篇中却有着大量精彩的谈辞,可见宋代人亦认识到了魏晋清谈谈辞的口头文学性,口头文学对书面文学造成影响便不难理解。

清谈活动在魏晋比东汉更加深化,在此过程中谈辞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对仗、藻饰、音韵三个方面,恰恰是组成骈文的三种要素。同时期的骈文作品如上列《文赋》《天台山赋》与东汉《郭有道碑》等骈化散文相比,能明显看出文章在对仗、藻饰、音韵方面的进步与谈辞的发展同步进行,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具体引用文句分析。

三、南朝清谈活动新变与骈文文本的成熟

南朝清谈活动与魏晋相比既有继承亦有新变。继承表现为对仗、藻饰和音韵三方面于南朝再度迎来发展,可以说是程度问题。在开始说明

之前,必须厘清一个概念,即南朝的清谈活动与此前相比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谈论内容发生了改变。谈论活动并不一定涉及义理探讨,而是仅以谈论为竞赛游戏,体现出知识至上的倾向。南朝时音韵的发展不必多言,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且约撰有《四声谱》,其人也是“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12]242}谈辞在南朝则更加繁缛华丽,骈化现象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如《南齐书·周顒传》:“颒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又“每宾友会同,颒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卫将军王俭谓颒曰‘卿山中何所食?’颒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颒‘菜食何味最胜?’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13]813-814}我们从周颒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谈辞不仅华丽,而且注意使用颜色词。颜色词的使用是骈文藻饰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庾信《春赋》云“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醅酷。芙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14]76}风味、用词与周颒的谈辞何其相似!且周的回答最重要是体现出他对四声的理解以及使用:谈辞使用对句,工整且音韵铿锵,与平上去入暗含。甚至谈辞不光在南朝有了声韵上的发展,这种风气还蔓延到了北朝,给予北朝的清谈场合重大影响。《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载梁代大将陈庆之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的对谈,杨元慎的谈辞便颇具文学性与音韵美,于此节选一段以示“元慎即口含水噉庆之曰:‘……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口头犹脩,网鱼澹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臠,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溯浪,噉嚼沈浮,白芷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15]108}细读杨元慎之谈辞,着实精彩,而且音韵跌宕起伏铿锵,对声律的使用实不输南人,由此可反观当日南朝士人谈辞讲究音韵之风尚。此例表现在外交场合,亦可与下文南齐王融谈辞之记载相互参证。

清谈活动在南朝的新变,为谈辞开始大量用典。魏晋谈士在锻炼自己谈辞的时候,基本往音韵、藻饰、对仗这三个方面努力,以求在清谈活动中比对手高一筹。但在谈辞中涉及大量典故运用

在《世说新语》里不多见。反倒是南朝,尤其南齐以后,谈士在清谈活动中用事炫博的记载却比以往都要多。此时的清谈活动早已不局限于谈论佛老,更多为带有竞技性质的辩论或比赛,以此来显示文士风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九《华阳博议下》:“六代文人之学,有徵事、策事,徵者共举一物,各疏见闻,多者为盛……齐、梁之交,此风特盛,亦犹晋之清言”^{[16]401}。胡看出了隶事在六朝的兴盛,但将此区别于晋之清言,应是把“清言”范围限定为谈玄。若把清谈的含义扩大为谈论活动,玄学仅为内容的一种,那么南朝的隶事游戏也不过是变换了组织形式,内容更广的清谈活动。

王僧虔《戒子书》记载“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设令吾学如马、郑,亦必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13]662-663}由于记载南朝清谈的文献较少,因此《戒子书》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该文章的解读,余英时已有考证分析^[17],在此不多加论述。实际上,在《戒子书》中所体现出的竞赛风气可谓弥漫了整个南朝,最突出的表现为南朝人喜欢背诵典故来与他人争胜。如王融,便在接待北朝使者的清谈场合,在谈辞中加入典故来与使者互相辩驳“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13]910}王融之所以被皇帝看重,并在清谈场合“使兼主客”是因为融“有才辩”,在这种带有竞赛风气的清谈场合,只有谈论辩驳能力出色的人才足以压倒对方,不坠皇室的威严,更何况对方是北朝“虏使”呢?在这次交锋之中,王融本人的谈辞就使用了汉武、司马相如的典故,更有趣的是,最先使用这个典故的竟然是北魏大臣宋弁。若从民族文化交流频繁的南北对峙局势下解读这次清谈,则宋弁谈辞用典用骈是受到南朝清谈的影响。

南朝清谈之所以有谈辞隶事用典的风气,王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南齐书·陆澄传》:“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

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13]761}“商略”一词,便含有品评、谈论之意。甚至在谈辞之中使事用典的风气也蔓延到了书面创作。如《南史》卷四十九《王湛传》附《从叔摛传》:“湛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18]1213}直到梁代,这种风气依旧不减。如《梁书·沈约传》:“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12]242}反映出清谈用典的强烈竞赛性与胜负性,也从侧面说明了这种风尚在当时的流行。自南朝开始,骈文的四大要素:对仗、声韵、藻饰、用典均在清谈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骈文最终在南朝完全走向成熟。

谈士与文士的结合在南朝依旧紧密,除上述沈约诸人,还有一些著名文学家雅好清谈。如谢眺《游后园赋》:“藉高文兮清谈,豫含毫兮握芳”^{[19]37}。何逊《酬范记室云》:“清谈莫共理,繁文徒可玩。”^{[20]2-3}以上两例亦是清谈与文章并举,不难看出清谈在南朝依旧与文章有着紧密关联。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杰出的文士往往不是最著名的谈士,如《世说新语·文学》:“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9]443}乐广是西晋时的清谈领袖,却不善属文。此外,王弼《老子指略》,何晏《无名论》等文章虽骈句较多,但整体艺术水平不如同时代著名文学家。人们仍将他们视为清谈领袖而不是文坛领袖。而陆机、沈约等人为一代文宗,且有清谈背景,却不以清谈著称。《文心雕龙·论说》亦云“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21]270}由此看来,谈辞与文辞之间似乎有所抵牾。若要建立起骈文与清谈的关系,需对该现象作出分析。

首先,最杰出的文士虽大多不是最杰出的谈士,但并不是没有清谈,文章俱为当时翘楚的人存在,如阮籍、嵇康就是二者兼长。此前提到的王僧虔《戒子书》所言“谢中书挑汝言《庄》”就将谢庄

列为当时最著名的清谈家,谢庄亦为同时代最好的文士之一,他的《月赋》《殷贵妃诔》是宋代骈文中的代表作。而之所以清谈、写作俱优的人较少,有时是因为人的资质有限。如《晋书·文苑传》便载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10]2376}《文心雕龙·体性》亦云“才有天资,学慎始习。”^{[21]373}虽主要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却从侧面反映出人有天资差异。

其次,成为杰出清谈家与成为杰出文士所需的条件并不相同。杰出的清谈家最重要是精深义理,其次才是长于口才。可若想写出好文章,则离不开个人内在的生命体验与外在的社会经历。东晋以来,清谈大都因袭汉末西晋留下来的旧论旧注,少有创见。再加上谈论活动本身游戏性质不断加强,清谈渐渐流于空疏。此种情况下,清谈家视野受限,人生经历亦狭窄,所以陈寅恪认为东晋清谈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22]201}。而陆机、鲍照、谢灵运等人均因各方面原因,社会经历与个人生命体验比较丰富,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士。庾信本人由南入北,前后诗风的转变就很能说明社会经历与作家内在生命体验对文学能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骈文十分擅长说理,是以并不存在谈辞与文辞因说理而相抵牾的情况。魏晋南朝兴盛的论说文大抵骈俪化气息较重,《文心雕龙》更是全篇骈俪化的说理作品。魏晋南朝论说文与清谈之关系,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已论述甚详。骈文是一个“大文体”概念,并不只有论说文一类。哪怕清谈水平达到极致,也不过是论说文、俳谐文写得更好罢了。蔡邕、谢庄等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清谈家,写出许多高质量骈文,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耽溺于清谈,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与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许多骈文体类他们都擅长,而不仅仅局限于论说文、俳谐文。

四、结论

文体的生成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代风气往往能凭借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文体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在汉魏六朝时期,风气对文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清谈谈辞在对仗、音韵、藻饰、用典四个方面的发展,促进了骈文文体的正式生成。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发展与谈辞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且迎来发展的方面也大抵相同。因此在分析某一文体时,我们既要看到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也要看到外部因素在文体面貌生成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以单一视角

看待文体的生成,是不全面的。

注释:

- (1) 《晋书·纪瞻传》卷六十八记载有陆机与纪瞻的清谈:“(陆机)又问曰‘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以隗育,四时所以化生……思闻辨之,以释不同之理。’”第1818页。
- (2) “意对”顾明思义就是句子所表达的句意能够形成对仗,但是具体到形式方面,对仗是不工整的。如《离骚》:“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 而已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2] 彭玉平. 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J]. 中国社会科学,2001(2):143-154.
- [3] 何诗海. 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学[J]. 学术论坛,2009,32(7):70-74.
- [4] 刘季高. 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周祖撰. 先唐文苑传笺证[M]. 胡旭. 笺证.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 [7] 萧统. 文选[M]. 六臣. 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 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 黄霖. 陈维昭. 周兴陆. 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M]. 周兴陆. 辑校.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 [10] 房玄龄. 褚遂良. 许敬宗. 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3]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4] 庾信. 庾子山集注[M]. 倪璠注. 许逸民. 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5]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释[M]. 周祖谟. 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6]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17] 余英时. 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J]. 中国文化,1993(1):22-31.
- [18]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9] 谢朓. 谢宣城集校注[M]//曹融南校注集说.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0] 何逊. 何逊集校注[M]. 李伯齐. 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1] 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M]. 陆侃如. 牟世金. 译注. 济南:齐鲁书社,1995.
- [22]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责任编辑:王乐]